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关于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赵鹏

国有企业要不要抓党建,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方向、关乎性质的根本问题。在国有企业里,党建工作从来不是一项可以单独拎出来谈的工作。这个道理,党务工作者都懂,可落到企业实际运行中,差距就出来了。

2016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此后这几年,党建要求写进公司章程,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成为制度安排,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全面推开。可以说,在制度框架这个层面,党的领导已经嵌入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每一个环节。

框架搭起来了,不等于事情就办好了。到企业里走一走,融合做得深不深,差别很大。有的企业把党建做进了决策链条,公司运转顺畅,出了问题有人负责、有章可循;也有有的企业,党建材料堆得很厚,实际上和经营管理隔着一层皮,各说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是想搞清楚“党的领导进公司治理”这件事,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一、先要厘清一个认识问题

很多争论,根源在一个误解:党的领导进入公司治理,是不是意味着书记说了算?现代企业制度是不是就不管用了?

“两个一以贯之”其实已经把关系讲清楚了。现代企业制度解决的是企业怎么运转、权责怎么划分、效率怎么保证;党的领导解决的是企业为谁干、往哪走、出了大问题谁来负责。一个管效率,一个管方向,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缺了哪一头,国企都办不好的关系。之所以有人把两者看成矛盾,跟历史惯性有关。国企改革历程中,有一段时间强调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一度说不清;反过来,如果只强调党管一切,又容易回到行政化、机关化的老路。两种倾向都走过弯路,今天讲融合,恰恰是要跳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路。

实践中常见的偏差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党委会当成“橡皮印章”,重大事项虽然走了前置程序,真正定事还是在董事会或经营层那里,党组织的意见没有进入决策;另一种是反过来的,把党的领导理解成什么都要党委把关,前置研究变成了前置审批,党委会开上几个小时,讨论的却是具体采购价格、个别岗位调整,把经理层该管的事揽了过来。两种偏差表现相反,病根却相同:没有想清楚,党委在这个企业里到底该管什么、不管什么,边界在哪里。

这里其实涉及一个更根本的定位问题。党组织在国企中的作用,不是要替代哪个治理主体,而是要让决策链条里始终有一个对长远负责、对方向负责的力量。这个定位立住了,后面一系列机制问题才谈得下去。

二、难在几个具体环节

融合喊了这么多年,难就难在几个具体环节上。

一是制度接不上茬。章程里写了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可公司章程、党委前置研究讨论清单、董事会议事规则、经理层授权办法,往往是几套文件各写各的。前置研究的事项,和董事会、经理层的决策事项对不上。程序走了,党委的意志却没有转化成企业的决策依据。接不上茬,融合就停在纸面上。

二是前置程序空转。这是不少企业的通病。清单上列了十几项“重大事项”,看起来覆盖全面,细看每一条都模糊,什么算重大、按什么标准,没有量化。有的企业把党委会当成“第二董事会”,董事

会会议的事,党委会先议一遍,意见基本一致,等于多了一道手续;有的企业把党委会开成情况通报会,大家表个态,真正的决策在会前已经形成了。程序在走,作用没发挥,这是最典型的“两张皮”。

三是交叉任职的角色边界不清。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制度上把两个角色统一了,实践上对个人的要求极高。什么时候以书记的身份说话,什么时候以董事长的身份说话,没有清晰的边界。决策顺利的时候没人觉得有问题,一旦遇到重大分歧,两种身份容易搅在一起。要么党组织把关的职责让位于效率考量,要么书记的身份压过董事会的程序,两种倾向对治理结构都是伤害。

四是考核评价各唱各的调。党建考核和经营业绩考核是两套体系。党建考核看台账、看开了几次会,经营考核看指标、看利润、看安全,中间没有桥。结果就是,干得好的企业,党建工作未必被认可;党建搞得热闹的企业,经营未必见成效。基层同志心知肚明,只是没人点破。

这几个问题,表面看是操作层面的,往深里说,是融合还停留在“组织嵌入”,没有走到“机制融合”。组织架构上,党委、董事会、经理层都在;运行机制上,三个主体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这是问题的要害。诸多实操堵点的存在,致使党建引领治理、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难以落地,无法真正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三、融合要从机制上找接口

认清问题之后,出路也就清楚了。融合不是两张大皮贴在一起,而是在决策、执行、考核的具体机制上找接口。

第一,把前置研究事项做具体。前置研究最怕笼统。企业应当结合行业特点、资产规模、管理

幅度,把重大事项的清单具体化,能量化的量化,能分级的分级。什么事情必须上党委会,什么事情授权经理层,边界划清楚。清单清晰了,前置才不会变成空转,也不会变成越位。这一条做好了,党委的把关才是真把关。

第二,用权责清单把边界固定下来。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的权责,最好落到一张清单上。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具体到一家企业,就是管什么、不管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边界清晰了,交叉任职的干部切换角色就有依据,不用靠个人的领悟和拿捏。制度能解决的问题,不要交给个人去把握。

第三,把考核的桥搭起来。党建考核要往实里考,不能只看开了几次会、写了多少材料,要看党组织在重大决策中起了什么作用,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顶没顶上去,职工队伍稳不稳。经营考核里也要有党建的维度。两者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考核指向哪里,工作就会跟到哪里。

第四,让基层党建回到业务场景中去。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不是靠开会体现的。重大工程、技术攻关、安全生产、降本增效,这些具体场景才是检验基层党建的考场。党员突击队、党员责任区这些做法之所以管用,不是因为形式新,而是因为它们把组织优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在了一起。离开业务场景谈党建,基层的同志不买账,也长久不了。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说到底不是一道理论题,而是一道实践题。制度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接下来的功夫,是把每一条规则接上茬,让党委的每一次把关都真正影响决策,让党组织的每一次活动都真正解决问题。国企党建做得怎么样,不在于材料写了多厚,而在于企业运转顺不顺、方向正不正、职工认不认。

(作者单位:周口城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避免宣传的冷热不均。

四、立足本地实践,以“周口之治”印证思想伟力

理论的说服力最终来自实践的检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复兴的内在逻辑。对于地市级纸媒而言,最有说服力的宣传方式,是把这一思想在本地落地生根的实践成效呈现出来。周口市近年来深入推进“五星”支部创建,让一些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焕发新生,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强堡垒。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蝶变故事,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周口答卷。

做好实践报道,需要处理好“面”与“点”的关系。“面”上要系统梳理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部署和阶段性成效,可以通过专题报道、系列访谈等形式呈现;“点”上则要深入挖掘典型案例,用细节和人物展现思想的力量,让读者从身边的变化中感受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重要思想宣传阐释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的传播效果。地市级纸媒虽然平台有限,但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不可替代。周口日报社依托社科理论版的学理深度、时评专栏的观点锐度、基层报道的实践温度,正在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党建思想传播格局。面向未来,只有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守正创新、融合传播,才能让习近平党建思想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转化为推动周口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周口日报社)

数字化背景下劳动异化的新形态与超越路径探究

闫洛淳

信息时代,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深刻重塑了人类的劳动形态与生存方式,平台经济催生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型数字劳动者,打破了劳动的物理边界并重塑了时间弹性。

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突破8400万人,但一个悖论随之浮现:数字劳动在形式上越“自由”,劳动者在实质上越可能陷入深层异化。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耦合未能扬弃异化,反而加剧了劳动主体数据化、劳动过程碎片化以及劳动目的利益化。数字劳动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劳动效率提升的同时劳动者异化程度同步加深。

一、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四重表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比传统工业时代更加隐蔽、深刻的全新形态。

劳动成果异化。数字时代,劳动者每天产生海量数据,但其所有权与收益权被平台垄断。劳动者创造了数据价值却无法享有收益,反而被算法根据历史数据不断调整的派单逻辑与考核标准反向规训。劳动者沦为“数据矿工”,劳动成果异化为支配自身的力量。资本拓展了生产性劳动的来源,在掩盖新型异化关系的同时,诱导主体无意识地为资本生产数据。

劳动过程异化。大数据算法继承了泰勒主义逻辑,借助大数据将管理权力深嵌劳动过程,通过拆分标准化微任务、持续监控绩效来实现精细控制。外卖骑手受制于极致的时间规训与空间监控,其劳动异化为时空、情感与数据异化交织的循环链条。

人类本质异化。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数字时代人的创造性活动被降格为数据驱动的工具性操作。主播情感、创作者灵感被资本化和算法化,劳动者被降维为“数据生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时代催生了所谓“娱乐化劳动”的现象——游戏化、创意化的劳动特征赋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与愉悦感,形成对传统异化劳动的反抗假象。

人际关系异化。数字时代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数据关系,劳动者间缺乏真实联结,取而代之的是平台中介下的“弱连接”。算法推荐加剧了圈层化与社会关系碎片化,真实交往被简化为交换逻辑,同时数字身份物化引发了人机信任危机与社会关系的数字化重构。

二、数字劳动异化的伦理审视

数字劳动异化触及劳动正义、人的尊严与主体性等核心伦理范畴,亟须进行规范建构。

主体性的消解,从“目的”到“手段”的伦理坠落。数字资本逻辑下,劳动者从能动主体沦为被算法支配的客体,劳动固有的创造性被算法剥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价值判断降维至概率计算,消解了具有反思性的张力,导致主体在数字镜像中迷失自我本质。

劳动正义的偏离,自由表象下的剥削实质。劳动正义要求劳动者公平享有劳动成果与尊严,但资本用“自由劳动”幻象掩盖对剩余价值的全方位索取。劳动者在享受灵活就业、自主接单、弹性工时等形式自由时,也被束缚于持续的剥削机制之中,背离了劳动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指向。

伦理原则的提出,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伦理学的追问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规范命题:在数字时代,我们应当坚持怎样的伦理原则来引导技术的发展?

笔者认为,核心原则可以凝练为“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层面的伦理要求:其一,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得将劳动者降格为算法的被动执行者;其二,确保劳动者公平享有劳动成果,算法规则的制定应当透明、可协商、可救济;其三,技术的发展应当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而非以牺牲人的尊严与幸福为代价。

三、超越数字劳动异化的路径

克服数字劳动异化,既不能简单地否定数字技术,也不能放任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需要在制度、技术与主体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起多维度的超越路径。

重构劳动关系法律框架与分配正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基础性保障。要突破传统“劳动者—雇主”的二元框架,探索新型劳动身份认定,为零工经济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2022年修改实施的工会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算法协商扫清了法律障碍。要加强平台反垄断与数据权益分配,2026年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规范了订单分配、抽成等核心协商内容,标志着我国平台用工治理从企业单方管理向多方协同共治深度转型。

驯服算法权力,推动算法向善。技术层面的变革是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的关键支撑。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红线,通过算法审计及人机伦理委员会建立对算法的多元监督机制,以“向善可控”规制算法权力。近年来,多家头部平台通过协商取消超时扣款、公开判责算法,有效降低了用工风险与申诉率,证明算法向善切实可行。《指引》亦要求平台践行“以人为本”原则,将劳动者健康放在首位,杜绝算法导致的超负荷用工问题。

唤醒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与数字素养。劳动者需提升数字素养与批判意识,在算法逻辑中保持反思能力,主动遵循法定程序行使权利。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价值观,通过工会牵头、党团与劳动监察部门协同的监督体系,培育数字时代的共同体文化。劳动者主体性的回归需要个体觉醒与集体力量结合,重塑数字技术社会关系,使技术从支配人的力量转变为服务人的力量。

数字劳动异化是资本逻辑与算法技术深度合谋的产物,劳动者在看似自由的劳动中恰恰遭遇了更为隐蔽的自我否定。克服这一异化,需在制度层面重构法律基础与分配正义,在技术层面驯服算法权力,在主体层面唤醒批判意识。三者协同发力,才能使技术真正回归“属人”本质,让数字时代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而非新的异化枷锁。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欢迎来稿

各位读者,本版的《学术前沿》《思想观澜》《视野纵横》《学界动态》等栏目长期征稿,欢迎来稿。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时请注明栏目名。

电子邮箱:zkrbwjf@126.com
联系电话:0394-6193890

以精准理论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落地

吴继峰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核心主轴,以“十四个坚持”为理论主体,涵盖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与方法路径五层递进逻辑。地市级媒体作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如何在扎根基层的媒介生态中,把这一博大精深思想体系阐释好、宣传好,是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重要课题。周口日报社依托社科理论版、时评专栏、基层报道等多层次平台载体,探索具有地市特色的党建思想传播路径。

一、深耕理论阐释,筑牢学理化传播根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做好宣传阐释的首要任务是把握理论本身的学理逻辑讲清楚。《周口日报》每周推出的社科理论专版,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阐释提供了稳定的阵地。近年来,周口日报社、周口市社科联联合在社科理论版推出“智汇三川大潮涌”等专栏,刊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围绕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周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讨。这种“研究+咨政+宣传+转化”的联动模式,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面向大众的理论传播产品,使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阐释既有了学理支撑,又有了实践指向。

做好理论阐释,关键在于讲清楚“从哪里来”的理论渊源和“往哪里去”的实践要求。《周口日报》社科理论版可以进一步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围绕“十四个坚持”设置系列专题,

邀请党校专家、高校学者撰写深度解读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源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根基、新时代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基础等维度,系统揭示这一思想的理论生成逻辑。同时,注重将理论阐释与周口本地党建实践相结合,比如围绕“五星”支部创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周口特色工作,组织理论工作者进行案例分析和经验提炼,让读者在“周口故事”中感悟思想的力量。

二、强化评论引导,架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理论要入脑入心,离不开有效的落地转化。时评和短论是连接“大道理”与“小日子”的有效载体。《周口日报》每周一推出时评专版、《周口日报》二版也常态化开设“今日谈”和“沙颍时评”栏目,这些平台以题材广泛、形式鲜活、观点新颖的特点深受读者关注。“今日谈”侧重从具体工作切入,以小见大阐释党建工作思考 and 实践;“沙颍时评”则关注社会热点,在评论中融入党建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种分层次、多角度的评论格局,可以使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传播既保持理论高度,又贴近群众的话语习惯。

评论引导的核心在于“转化”,在于把思想体系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工作要求,把理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原则,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方针。这些重大论断落实到地市层面,就体现为各级党组织如何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党员干部如何在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理论和评论文章应当善于从基层党建的鲜活

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观点,比如从“党员量化积分管理”这样的微观创新中提炼从严管理党员的经验,从“车轮上的党支部”这样的特色做法中阐释新业态党建的探索意义。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让党建思想从文件语言走进工作语言,从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话语。

三、创新融合传播,拓展思想传播的广度深度

地市级纸媒的传播力虽然受限于发行范围,但在数字化时代,纸媒的内容生产能力可以通过融媒体渠道获得更大传播力。周口日报社已形成了涵盖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的全媒体传播格局。这为宣传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多元传播的基础条件。

在融合传播方面,可以做几方面的探索。一是“理论+故事”的融媒表达。把社科理论版的深度文章转化为短视频、图文海报等轻量化产品,用故事化的方式呈现理论观点。周口本地也有丰富的党建故事资源,从大学教授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致富,到农技专家数十年扎根田间践行党员初心,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就是党建思想的生动注脚,将其制作成融媒产品,能够实现“大道理”与“小故事”的有机融合。

二是“线上+线下”的互动传播。依托“周道帮办”等平台收集基层党建的鲜活素材,将读者反馈转化为报道选题,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三是“集中+常态”的节奏把控。在“七一”等重大时间节点集中推出党建思想宣传专题,日常则通过时评栏目保持常态化引导,